

目 录

在接见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时的讲话	杨尚昆 (1)
期望一部好的中共党史早日问世	薄一波 (2)
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	胡乔木 (5)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	胡 绳 (9)
进一步加强党史工作	沙健孙 (16)
党的文献工作的意义及文献编辑工作中 的几个原则问题	逢先知 (24)
党史研究部门管好用好档案资料的意义和方法	王明哲 (30)
关于搞好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 问题	王雨亭 (34)
发挥党史工作在党的建设中的作用	江 怡 (39)
加强党史研究, 积极为现实服务	郎冠英 (43)
遵循中央方针慎重解决党史中有争议的问题	陈遐瓚 (46)
征集与研究相结合, 促进党史工作全面发展	王中杰 (50)
我们的党史工作是怎样为现实服务的	董本来 (52)
我们是怎样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	彭 塞 (56)
在党史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樊宪良 (59)

会议学习材料

中央领导人关于党史工作的若干论述	(61)
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6)

会议参阅材料

有关中共党史的若干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	(71)
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78)
附一: 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材料目录	(94)
附二: 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史机构通讯录	(58)

在接见全国党史工作部门 负责人时的讲话

(1990年3月13日)

国家主席、中央
党史领导小组组长 杨尚昆

我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昨天、今天都有会议，军委现在正在开会。我感到我应该来看望大家。

报上有关一波、乔木同志在你们会上讲话的报道，我都看了。乔木同志讲的党史工作要有真实性、科学性和战斗性，我很赞成。他们对党史工作所提出的要求，我都同意。

今天这么多同志在座，可以说是“群贤云集”。有这么大一个班子、这么大一支队伍搞党史工作，是不容易的。这些年来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很多成绩。我的希望只是一个，就是刚才跟胡绳同志讲的，尽快把党史写出来。乔木同志也是这样希望的。

我们党成立快70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比较好的党史，说不过去。党史教科书出了不少，恕我不客气地讲，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或者是材料堆积，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新东西。中国共产党是有着长期斗争历史的有丰富经验的党，有许多和外国党不同的特点，党史资料又很多，我们有条件把它写出来并把它写好。

现在苏联、东欧发生风波，这给我们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党究竟站得住站不住？这也是这次六中全会讨论的问题。你说我们站得住，这就要说出几条理由来。在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这都是大问题，都要用党史作出回答。现在有些人不那么坚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动摇，说苏联搞社会主义已经70多年了，我们比他们小30多岁，他们出了问题，我们能行吗？这也要用党史来回答。

胡绳同志你看哪天能把党史写出来？当然也不能靠你一个人，还要靠大家。我已经83岁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党史书，希望你们把党史本编写出来。就是这个希望。（乔木同志插话：建国前的党史本大致已完稿，今年能出版。明年建党70周年，准备编出一本《中国共产党70年》。）那好呀！（乔木：今年把建国前的党史本搞好后，就转移力量，集中编写建国后的党史。）是否有个计划，有一个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我看党史本难以做到大家都满意。一拿出来就很好，是不可能的。还要经常修修补补。

党史领导小组的工作具体由乔木同志抓，我挂个名。党史工作很重要。我希望各省都要支持，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党史工作。老同志可以提供材料，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年轻人。我们年纪大了，事业是要继承下去的。光靠在座的老同志搞党史还不够，要后继有人。

今天我是来看望大家的，不是接见。党内同志怎么能说“接见”呀！（有的同志讲：代表同志恳切请您来看大家。）那好吧，照个像留念，外面下点雨关系不大。

（此稿不得转载发表）

期望一部好的中共党史早日问世

(1990年3月8日)

中顾委副主任、中央
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薄一波

今天集中这么多党史工作部门的同志开会，商讨如何加强党史研究工作，尽快地写出一部好的中共党史，可能还是第一次。我一走进会场，看到这兴旺的情景，非常高兴。

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乔木同志抓这件事。乔木同志很认真、热情，把尚昆和我也推荐到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来。实际上，我对这一工作没有做过什么事。乔木同志一向关心党史研究工作。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实际上是他在具体抓。今天会议把我请来，要我讲几句话。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写出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不能再拖了。我之所以用“刻不容缓”四个字，是考虑到：

一、我们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漫长的、光荣伟大而又曲折的道路，明年将迎接她的70周年生日。这些年来，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般的党史书籍、党史资料已经出了不少，但离全党同志所期望的写出一部好的党史，相距甚远。一个为国家独立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已拥有4800万党员的大党，至今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完整的党史，应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

二、我们党是有丰富经验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曾发生过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延安整风，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和政治上的成熟。从党的七大到八大，一共11年，我们党就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历程。尽管在建设发生过重大的失误和挫折，但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奇迹，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虽然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一生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不磨灭的，他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纠正过去的失误，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10年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当然在具体工作指导上也出现

了一些失误。不论是成功和失误，我们都应加以实事求是的总结，使之成为全党的宝贵财富。

三、去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以及随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剧变和动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思索。现在，我们倍加感到，党和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是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而象有的国家那样，全盘否定党的领袖人物，否定几十年来党的奋斗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那除了给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抹黑、自毁长城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想到这些，就更加紧迫地感到，需要写出一部实事求是的党史，这对于教育今人和后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写好一部党史的基本条件我看现在已经具备了。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历史决议》，我看基本上可以作为党史的框架；中央档案馆珍藏了丰富的党史文献资料；原来的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又征集到了不少东西；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搞出了个建国前的党史稿子，当然还需要修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费很大的力量，但无论怎么说，可供修改的基础总算是有了。

五、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年事已高，了解过去的历史和亲身经历过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按照自然规律，老同志总是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比一年少。我们要趁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有利条件，尽快把党史写出来。再拖下去，就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这件事情已刻不容缓，不能再拖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意见。

第二点，对党史资料要进行鉴别、分析、研究，力求做到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党史如何写？乔木同志是行家，他会讲的。我只谈一点感受。已出版的党史方面的书，我没有全看，有时也翻翻，特别是对过去熟悉的地方如华北地区的党史资料，一翻就常常发现有错误。我在山西不算最老的，只能算半老吧！彭真同志健在，他比我年纪大，他对山西的历史，至少是开头那一段的历史，比我清楚。我感到，有些历史问题要定论就比较困难。例如，对王仲一（又名王振翼）这个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看法就不一样。王是山西阳高人，建党初期，做过工人学生工作，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在山西算是个有名的人了。但是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消极了，1931年又加入了“非常委员会”，同年，他被“非常委员会”派到北方来活动，跟脱党分子韩麟符等搞在一起，后来被抓进监狱里神经失常后病故。他虽然是早期的党员，也做过一些工作，但表现并不好。我曾接到过一些来信，地方上的同志坚持要写他。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他没有出卖过同志，也没有做其他的坏事，但就他的整个经历和表现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个好的革命者。要很好地鉴别。刚才我说了，现在还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如果这批老同志不在了，就无法辨明这些事了，就可能把他们写成革命家了。因为本地人对自己地方出的“名人”自觉不自觉地总愿意多写一点，写得好一点。所以，我认为征集党史资料固然重要，对征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鉴别，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更重要。

第三点，要集中力量，通力合作。过去，中央搞党史工作的部门有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力量比较分散。现在，党研室和征委会合并了，这是很重要的决定，因为写党史离不开资料的征集，合在一起大有好处。可以集中力量，拧成一股绳，便

于领导，有利工作。也曾考虑过把文献研究室也加进来。后来又想到那里的工作任务已经很重了，合起来有困难。虽然不合了，但要加强配合，通力合作。除了中央党史工作部门的配合之外，还需要全国各级党史工作部门、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者及各地档案馆的支持与协作。我想，有党中央的领导，有尚昆同志的支持，又有乔木同志的关心和具体指导，加上胡绳同志牵头和全国党史工作部门的通力合作，全党同志期望的一部完整的好的中共党史，一定能够早日问世。

(根据记录整理，作者作了一点增删)

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

(1990年3月8日)

中顾委常委、中央
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胡乔木

同志们：

在平息了去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在全党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今天，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全国党史工作部门的代表举行座谈会，这是非常必要的。党史工作是党的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所指的主要就是要向青年和人民进行关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党史工作座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来更有效地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我祝贺这次座谈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功。

大家知道，去年春夏之交的70天的政治风波之所以发生，是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所决定的。这场风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迟早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及时地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经过党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来所决定和执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步骤，国内的小气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党中央决策的正确和必要，现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大气候仍在继续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很明显，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就有了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刚才一波同志指出，编出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刻不容缓，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希望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全体同志，能够集中力量，统一步伐，实现一波同志所代表的所有老同志的愿望。现在我想就怎样加强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加座谈会的各位同志讨论时参考。

一、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西方反共势力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政策，根本上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否定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当然也就要否定、歪曲和污蔑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他们的种种论点，归根结底，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中国过去应该实行资本主义，现在仍然应该实行资本主义；过去不应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就应该放弃社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与这种反动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兴起和胜利的。但是我们的胜利不是最后的，因为敌对势力还很强大，它们还在时时处处企图颠覆我们，压服我们。我们的

党史工作者，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同志一样，必须站在与这种敌对势力、敌对思潮斗争的最前线。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

二、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象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诬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象。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党的产生、兴起，是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全国范围的持久的胜利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唯有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每个细节，而是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说的。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的中国，发生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了工人运动以后，跟国民党合作，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大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又领导农村的土地革命战争，发展了工农红军。到抗日战争前夕，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然后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爱国民主力量由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发展成了强大的势力，得到全国人民坚决的拥护，以至国民党在后来挑起的全国内战中遭到惨败。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可以任意改变的吗？当然，它们都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很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很快的发展，尽管中间出现了很多曲折；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八位；国家取得了独立，这个独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的，以前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国家实现除台湾以外的真正统一；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和巨大的改善，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由于这一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支强大的力量，谁也抹煞不了。谁也别想再让我们受人支配。这一切都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的党史工作要科学地论证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趋势的，如果过去采取其他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一切。如果今天走其他的道路，中国只能出现大混乱、大倒退。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觉悟的工人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社会，才能解放自己。因此，他又忠实地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为什么为农民的解放，为全民族的解放，为各少数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那样艰苦卓绝和英勇顽强的斗争。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现在西方世界以及受西方影响支配的一些国家，泛滥着这么一种思潮，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失败了。这种现象本身也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清楚。至于在中国，至少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牢牢地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十一亿人民中间。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中国现在所进行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些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又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还要阐明，党的斗争的胜利都是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才取得的。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经过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从党的历史上说或从现实来说还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但总体来看，我们党跟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牢固的。去年的动乱、暴乱所以能平息，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形势，总的来说是稳定的。靠的是什么？正是因为我们党与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在长时期斗争中形成的血肉联系，人民认识到，人民的前途离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同样也离不了人民。因此，我们在研究、著述我们党的历史时，必须时刻牢记着，党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才取得胜利的。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党的历史不仅仅是党的领导者、干部、党员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党的一切合作者、支持者的历史，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

以上说的，都是如何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的几个主要问题。

三、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同时，必须加强对国外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信息的研究，注意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

四、加强和改善党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我们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教育全党。我们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从事党史的教育，已有长久的历史。这中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哪些不成功的教训，需要怎样改进，这些问题，希望党史学界要同有关的教育部门进行专门的研究。无论是在党校还是在普通学校里，关于党史以及革命史、近现代史的教育，都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一工作究竟进行得怎么样，还存在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史工作者有责任从这方面来进行总结。同样，关于党的历史的宣传，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在报纸上，在电影电视戏剧上，在各种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工作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也需要进行总结，研究加强和改进的办法。使得党的历史、革命史的教育和宣传得到加强和改善。

五、对有关党史出版物的领导和管理需要加强。近些年来出了不少关于党史、革命史的书籍、人物传记和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纪实文学。一方面有很多很好的著作；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严重的混乱现象。有的书对党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歪曲，任意的捏造，对于党的领袖人物的活动进行种种歪曲的宣传，甚至胡编乱造。这种现象，即使在经过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整顿报刊、出版物的斗争以后的今天，还常常令人触目惊心。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党和政府有关的主管部门制定出明确有效的管理办法；另一方面，也要求全国的党史部门的同志和所有的党史工作者大力协助党和政府的主管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对自己的工作也要进行自我清理、自我整顿、自我约束。因为，一些很不好的作品的出现，往往是同一些党史研究机构的同志参加分不开的。坚持不懈地做好这项工作，应

该成为检验党史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问题希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能研究一下。

六、要加强党史工作队伍本身的建设。过去我们在党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同我们有一支比较整齐的队伍和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是全国党史工作者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从去年的政治风波的考验来看，我们的这支队伍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从去年的政治风波中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严格地按照党有关清理、清查的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严肃的清理整顿，这项工作绝不允许走过场。要使党史工作机构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使党史研究部门的全体同志更加坚定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身为党史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无数的忠诚，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我们要用党的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如果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自身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又怎么能正确地开展我们的工作呢？所以，我们应该对从去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总结，对我们自身的队伍认真地清理整顿，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贯彻始终。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培养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新人。现在党史研究工作的队伍基本上是一支老年的队伍。如何培养新人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我提出以上六个方面的建议，请大家讨论时考虑。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

(1990年3月8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胡绳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同志们：

首先向从全国各地来的党史工作部门的同志表示欢迎，对中央各单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表示欢迎。刚才一波同志、乔木同志的讲话，对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史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们的讲话，不仅对这次会议，而且对今后整个党史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完全赞同。

我今天想讲的，主要是一件事，就是要重视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当然，并不是说，建国以前的党史不重要。恰恰相反，建国以前的党史也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我们党到明年就是70周年了。70年里，前28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以后，到明年就是42年了，是社会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至今仍然有重要意义。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事业还非常有价值。所以，如果我们象乔木同志刚才说的，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跟当前的实际和今后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这几年来，有些人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出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革命史进行种种歪曲，利用某些事实作出错误的解释。所以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革命史的研究，而不是说只要重视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以前的历史就不要研究了。

为什么要强调研究建国以来的历史呢？道理是很明白的。建国已经40年了，对于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的研究还很薄弱。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跟当前的现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40年又分为两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成就是非常明显的。1978年以前30年党的历史，虽然经过许多曲折，但也有很大的成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想否定中国革命；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进行歪曲，攻击说社会主义完全搞糟了，完全搞错了。他们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方面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攻击。从这点上讲，就更加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深入地进行研究。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说到研究40年的党史，当然有个资料问题。曾经在这40年的初期参与实际工作的许多老同志现在还健在，我们要趁老同志健在时把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掌握的资料保

存下来。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要强调研究建国以来的历史的一个原因。但是总的说，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的资料，还是相当多的，而且也有人初步作了一些整理。比如说，规模宏大的《当代中国丛书》就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他方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如何运用资料还有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使用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讲别的，只找错误、缺点、失误，抓住了就竭力夸大，进行攻击。当然，我们在建国以后，有成功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误的时期。我们曾经有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我们现在要科学地研究这些问题，要把一些错误、缺点的经验教训很好地加以总结。而这种总结，恰好证明我们最近十年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是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在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不能象那些诬蔑我们的人那样，把建国以来的历史说成一团漆黑。即使对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比如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确实是严重错误。大炼钢铁，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当然是错误的。有些错误，不但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违反了自然科学。这种错误的教训应该汲取。但是，如果说大跃进时期完全没有成果，也不能那么说。有材料说明，从建国以后到1964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三分之二以上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开工的。这个时期，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大庆油田是在这期间开创的。当然，如果不是那么急于求成，不是提出那些不切实际的口号，那么我们的成就应该更大些。虽然那时在指导思想上有许多严重错误，但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搞人民公社，确是包含了很多的空想、不切实际的东西，效果不好。但是也要认真看一下，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胜利，而在土改后出现的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这件事究竟错没错？我以为是正确的。在走合作化道路中发生许多偏差，急于求成，要求越大越公越好，过快地搞到高级社，尤其是搞到人民公社，这里确有许多教训。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做了许多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后来证明，还是不行。最后我们改变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转变，是不是说，现在农村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了，本来合作化就不应该搞？合作化毫无意义，完全错误？我以为不能这样说。中国的农村过去从来没有合作化的经验。合作化的经验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里是有的，中国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发现有些地方本来有变工队的组织，从这里发展为合作化，使几亿农民有了合作化的经验，知道了合作化在哪些方面可以起积极作用，怎样搞就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当然，可以说，进行这样一个学习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事情就是这样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取得相当多的成绩的。比如说，农民利用集体的力量，搞了许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农民对农业所作的很大的投入。农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只靠国家投入也是不行的，大量的投入要靠农民。如果只有个体经济，没有合作化，农民是不可能做出那样大量的有效的投入的。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增长很快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搞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村还保持着合作化中一些好的作法。有些地方完全抛弃了，后来看看不行，在有些方面还是要恢复。所以对于过去的合作化的全过程，应该加以分析，有缺点错误，也有好的一面。再比如说三线建设，的确有许多浪费，有

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林彪又乘机提出“山、散、洞”，浪费很多。但是中国过去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现在在这些原来根本没有工厂企业的地方，建起了一些新的、大型的企业，这应当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当然，如果搞得不好，应该少一些浪费，少付出一些代价。我以为对这些问题，都应该给予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说都是错误。对于确实存在的错误、失误，要认真地进行分析、论证，以便取得教训。我们现在都深切地感到经济再不能大起大落了，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就是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用来教育干部，更好地进行建设。但同时又不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过去的工作都是错误的累积。1978年以前的30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过去30年建设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政治上说，这里只讲一点，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是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的成就。建国后的30年中，不但打了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坚决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保卫了新中国，而且终于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承认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我们还曾坚决地反对苏联的大国霸权主义，独立自主地开创我们的局面。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从清朝皇帝到蒋介石都屈服于帝国主义，看帝国主义的脸色行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敢于和能够领导人民跟帝国主义对抗的力量。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不容易的，这对中国的命运有决定的意义。不屈服于任何大国主义的指挥棒也是不容易的，也对中国的命运有决定意义。因为我们经受了这些考验，我们的国家才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相处，才能在世界上不论发生什么风浪的情况下坚定地按照中国所应该走的道路前进。

对于许多事情，不是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错误的就一切都错，要作具体分析。研究历史，可以说，就是总结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经过实践，看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来检验预想是不是正确。但是这个检验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目标，结果胜利了，成功了，当然证明原来的预想是正确的。但也要进一步分析。成功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不足之处，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毛主席在刚取得胜利时就向全党指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许多新的本领我们还没有，我们还得学习。党过去主要在农村中斗争，管理城市的经验还没有。现在大家常说，中国的民主传统很少。虽说在我们的军队中、在我们党领导的农村政权下建立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民主新风气，不过，管理整个国家，我们的民主传统还是不够。对于这些，我们在总结经验时也要注意。

对于失败或者挫折怎么总结？这就往往更复杂一点。毛主席说过，我们的革命斗争是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遇到过两次大的失败，一次在1927年，一次在1934年。在1934年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对这个失败怎么总结呢？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说，你不是失败了吗？那就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还有一个托陈取消派，他们作出的是另外一种结论。他们认为，1934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不行，到农村去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完全错了。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我们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的历次会议都说，1934年的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不

是证明我们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而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好，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你看，对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就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

再说“文化大革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最容易利用“文化大革命”来攻击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有了结论，完全否定了这个错误。但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对这一点可以研究一下。而且我们也不要“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混为一谈。在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总结它的教训的时候，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进行仔细的分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只有武斗，只有混乱。这几年我国的农业生产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还搞了一些重要的大型企业，修筑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铁路工程和南京长江大桥，还有卫星上天。“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这些成就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成绩会更多。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听到一个小故事。有一位搞桥梁工程的科学家，被关在“牛棚”里时，仍在挂念着武汉长江大桥开始运营以后有点晃动的问题。这样的晃动从工程技术上说允许不允许？那时正准备建筑南京长江大桥。如果不允许，就要在新的桥梁设计上增添加固工程，成本就要大大提高。他老在考虑这个问题。不久，这个科学家从“牛棚”里被放出来了。他马上就做试验。但他没有实验室，就到街上旧货店买了些塑料、碎钢等材料做试验。最后，他证明这样的晃动是可以允许的。他把这个研究成果贡献出来，就为国家节省一大笔投资。当时我听了这个故事，很受感动。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受到迫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还这么认真地工作，为国家着想，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多么可贵！这样的人当时并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的。所以历史决议中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爱国华侨，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事实。从领导层讲，有周恩来、邓小平，还有其他许多同志都用他们的种种努力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有许多党内、党外的同志，在那个受迫害、遭折磨的时候，或者在认真地读马列主义的书，或者在认真考虑问题，或者做某种专门的研究工作，抵制这个潮流。“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虽然犯了错误，但也做了许多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也有所抵制和限制。如果问“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真正主角是谁？我说，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是那些党内、党外处于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党才能用自身的力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过来，而且用不长的时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刚才我说过，“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但确实证明“左”的路线、“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在“左”的指导方针下，就为林彪、“四人帮”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造成了放肆活动的条件，各种野心家趁机活动。这个深刻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住。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不止是这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证明了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大乱，就会发生大灾难。“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不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了吗？他们用“左”的口号来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能控制局面吗？只能造成大乱。能够领导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各种偏离和破坏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我想，应该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去反驳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点。以上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封建社会主义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诽谤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论点，就是说，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只能是扭曲社会主义，成为封建社会主义。他们说，共产党也是封建主义的。这些人高唱反封建，矛头实际上是针对着党，针对着社会主义。我们党的历史决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时候，固然说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但是，反社会主义的人把这一点夸大到把整个社会主义说成是封建主义。对这种谬论，我们应该给予有力的回答。

说到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30年代，我们跟托派就有论争。托派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封建主义已经是“残余的残余”了，根本没有什么反封建的任务了。而我们党强调，要反封建，中国还有封建主义。反封建从根本上说就是土地革命。中国社会不根本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就谈不上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我们解决了土地问题，打倒了代表封建势力的统治政权，把在中国维护封建势力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推翻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做到这些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改善自己的生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残余影响不可能立即消除，这是事实。在历史决议中，在邓小平同志的一些文章中，都承认还有思想政治上的封建残余的影响。我想推荐同志们再读一下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虽然这篇讲话是在1980年作的，但是可以说，把在反封建问题上最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许多错误论点预先都驳斥了。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确实说了，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以至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等，这些跟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他强调要从组织制度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明显，决不能象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再来一个反封建的革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人们的思想上还有许多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们的思想是实际生活决定的，但是实际生活改变了，思想往往并不是立刻就跟着完全改变。人们还不能摆脱封建残余的思想，或者小生产思想，怎么能靠一个革命去解决呢？只能靠改革和完善组织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的制度，靠发展经济，靠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例如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是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某些时期中央集中过多，不能因此就说这是封建主义。这一方面的错误，也不都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所以小平同志说要划清封建遗毒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如果说所有错误都是封建主义，要反封建，认为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结果实际上又变成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做法。

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今天我们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各种腐化思想的批判。如果认为要反对封建主义，就可以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完全错误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常常强调说，不能用封建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这话一般来说是对的。当然，我们不能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相比还是一种进步。

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也绝不能用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我们是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的意思是说，你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你就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封建的名义下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必须象小平同志所说的，警惕那些在反封建名义下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要反对，但是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遗产，不能一概说成是封建主义而统统加以反对。如果把封建时代的一切都说成是封建的腐朽的，都扔掉，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彻底论，实际上又回到红卫兵“扫四旧”的作法上去了。电视片《河殤》以为自己是彻底地反封建，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统统否定，也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创立的许多优良传统（就因为些优良传统不适合于资产阶级观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我以为，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党史上、建国以来党史上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们中国的经验以及世界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制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要经历许多曲折。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许多曲折。社会主义因为从来还没有什么完全成功的经验，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各种曲折复杂的现象。前些时候我看到香港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何必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走前人走过的道路好了，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资本主义道路就容易走、走得通吗？世界上也就是少数几个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达起来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轻车熟路地走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而且，怎么学习这种经验呢？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中国自己就经历过被瓜分掠夺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了，给日本2万万银元赔款。八国联军1900年一战，中国赔款4万万银元，再加上利息，大概增加到7万万银元。帝国主义是靠掠夺发家的，你怎么学它？有人说，台湾不是很快发展起来了吗？但是，台湾不过是一个小地区，50年代人口数只有一千三、四百万。美国把它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扶植它。有一个数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向台湾提供的援助，倾注的资金，包括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贷款，共达230亿美元，有的说是250亿美元。平均一个人大致是1800美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台湾有个高级经济官员曾说，如无美国经援，台湾的建设至少要推迟30年。台湾经济全靠加工出口，是依附于美国的经济。形象化的说法是，美国打一个喷嚏，它就要感冒。现在我们也搞加工出口，但只是在沿海地区，整个国家靠加工出口行吗？当然更不能依附于外国。再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了呢？不是的。1789年革命后，1893年罗伯斯庇尔当政，雅各宾专政，彻底地实行民主共和，斗争搞得很激烈。温和派就发动政变，把罗伯斯庇尔等人送上断头台。温和派当政几年，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拿破仑就以军事强人出来发动政变，把共和国变成帝国，自称皇帝。拿破仑帝国虽然基本上是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搞了不久，又被推翻了。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到1830年7月革命后，政权落到奥尔良王朝手里，仍然不是民主共和。然后又是1848年革命。接着是拿破仑第三称帝。不断地政变、动乱，经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直到1875年，建立了“第三共和国”，才比较稳定下来。可以说，这才大体上找到了一个适合于法国情况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这个模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发生了问题。所以说，资产阶级政权并不是

一下子就稳定下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过许多曲折。事实证明，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挫折和困难。去年春夏之交还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在首都甚至发展成为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革命暴乱。我们及时地制止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继续坚持向前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为了稳定，就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坚定的信心，对于世界上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生的困难，都能有正确的认识，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坚定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我们的党史工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我就讲到这里，不对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进 一 步 加 强 党 史 工 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沙健孙

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感谢各地区、各部委党史部门的负责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党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将要讨论在当前形势下党史工作如何更好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服务的问题；交流党史研究工作、宣传工作和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的经验；商议中央党史研究室同地方党史工作部门在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和党史专题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的方式，确定近期的合作项目。

下面，我就有关问题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一部分

我们这次党史工作座谈会，是在经历了去年春夏之交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之后，是在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开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际国内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为了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正确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我们的党史研究、宣传、教学工作，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搞好党史工作，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实生活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

实践表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要能够对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领导，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毛泽东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搞清楚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学习党史的热潮。一次是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时期，后来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后来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次学习，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推动党的事业的前进，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起过重大的历史性作用。事情很明显，如果没有对